

试析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中的苏联因素^{*}

——基于陈之骅先生学术成就的考察

康 乐 郭春生

[摘 要]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其中，苏联因素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密切相关。陈之骅先生从一个留苏大学生成长为一位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的《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提供了有关苏联因素的丰富资料和素材，同时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不断成长和繁荣。

[关键词] 社会主义发展史 学科建设 苏联因素 陈之骅

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 500 年发展史进行了阶段划分，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六个时间段，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2020 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启示我们，一定要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建设与研究。

陈之骅先生是我国著名社会主义发展史、苏联史研究领域的老一辈专家，2024 年恰逢陈之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 1950 年前中国共产党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21&ZD03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变局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研究”（22JJD710012）的阶段性成果。

^①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6 日。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300 页。

骅教授九十华诞，他的回忆录《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忠实记录了他从一个赴苏留学生一步步成长为苏联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以及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领域辛勤耕耘的历程。从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回忆录既反映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体现了陈之骅先生对该学科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苏联因素与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初现

进入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取得对国民党军的重大胜利的时候，1月底，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迎来了一位苏联客人，他就是斯大林的特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Микоян）。当时在西柏坡的几位中共高级领导人都与米高扬进行了会谈，提出了由苏联对将要成立的新中国进行援助的问题。1949年6月，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后，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秘密访苏，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取得苏联对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全方位指导和支持。在访苏期间，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帮助中国建立一所培养建设人才的学校，斯大林欣然应允。1950年10月，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基础上，由苏联援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大批苏联专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负责全校的马列主义理论与历史课教学工作。教研室中的苏联专家主要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教师则更倾向于结合马列主义原著讲授历史与理论课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涵盖的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史本就属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时就开始了新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课程教学。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严格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授课，也确实为中国师生传授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知识，特别是有关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知识。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在初创时期确实受到苏联因素的影响。

在苏联专家来华援助的同时，中国也派出大批人员到苏联学习。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系统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潮流。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陈之骅有幸成为“留苏潮”中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之骅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1952年，他以华东地区高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一年，恰逢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把新中国成立前仿效英美构建的西方高校体系改造为仿效苏联的体系”^①。1953年，刚读了一年的陈之骅就被选拔为赴苏留学生。1954年秋，他正式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接受系统的历史学教育。在列宁格勒大学三年级分专业时，陈之骅选择了苏联史专业。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高等院校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教学也由此发生了重

① 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30页。

大变化。在中国人民大学，摆脱苏联专家的影响、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的时期开始了。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示，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扩展高校学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学习和研究，在高校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课程。195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专门设置了历史系，历史系开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两个专业，同时仍保留了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教学内容彻底突破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教学范畴，扩展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对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革命、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第二国际等内容都进行专题讲解。这样，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包含进历史系的教学之中。历史系还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建设做了一项基础性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在1957年—1958年的两年间，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辑出版了一套13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具体是：之一、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基本思想；之二、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之三、第一国际；之四、巴黎公社；之五、第二国际；之六、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七、一九〇五—一九一四年国际工人运动；之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九、第三国际；之十、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工人运动与殖民地解放运动；之十一、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诞生及其发展（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之十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之十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党纲与党章^①。既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已经被设置为一个大学专业，也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基本形成。当然，学科的成熟还需要各方面不断地建设、发展和完善。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再次调整，以原来的两个专业为支撑，分别建立了马列主义基础系和中共党史系，马列主义基础系设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1960年9月，马列主义基础系更名为马列主义政治学系。值得一提的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下，我国第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初稿）出现了。马列主义基础系组织教师和研究生突击编成了一部两卷本共12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初稿）》，其中第一卷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写到俄国1905年革命，第二卷一直写到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这两卷书分别于1958年9月和10月出版，印刷1000册。这样突击完成的作品，自然免不了粗糙错漏，编者也承认，“由于资料不足，文献缺乏，时间有限，以及其他等困难，对一些问题有意地作了保留，有些问题阐发得过于简单，文字也还欠修整。在运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错误之处在所难免”^②。这套书在出版时特意标明是“初稿”，并且是内部出版“供讨论、修改用”。尽管有诸多不足，但这毕竟是中国编写的第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初稿。

1959年年底，从苏联学成回国的陈之骅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工作。他在工作中很快领悟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虽然带着一个史字，但

① 此处所用文字表达完全忠实于原书名。

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初稿）》（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前言。

重点在理论，通过历史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典作家的原著”^①。由此，陈之骅开始了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领域辛勤耕耘的生涯。

二、社会主义是研究苏联历史的最重要视角

在此，有必要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社会主义发展史”两个名称的联系和区别，二是“苏联因素”的内涵。

社会主义思想发端于1516年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所作《乌托邦》，在历经300余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后，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马克思、恩格斯把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国际时期，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多以“社会民主党”命名。十月革命胜利后，在1918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的七大上，列宁提出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他指出：“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②1919年3月共产国际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也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成为高校教育中通用的课程名称。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包括多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世界各政党间的党际交流日益密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重大成就。这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名称悄然兴起，“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史”的名称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更多地出现在教育教学和新闻媒体中。本质上，二者所包含的内容是一致的。

本文涉及的“苏联因素”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括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的一切与苏联有关的因素，例如，苏共二十大、苏联解体等事件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及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此外，“苏联史”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在上文提到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六个阶段中，“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逐步形成”两个阶段均属于“苏联史”的范畴。这至少提示我们两点。第一，苏联史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历史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社会主义视角是苏联史研究中最重要视角。一般来看，苏联史是世界史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属于地区史、国别史范畴，但是，对苏联史而言，仅停留在历史观念中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将社会主义的视角贯穿于苏联史的研究之中，许多历史问题就无法解释清楚，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视角是

① 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13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7页。

研究苏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视角。

陈之骅先生可谓是将社会主义视角贯彻于苏联史研究之中的杰出代表。1956年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问题上出现争论。1960年,苏联方面突然撤回了援建中国专家。此举不仅严重损害了中苏友好关系,而且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对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建设来说,这一事件倒也成为中国学者彻底摆脱苏联专家影响、进一步独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体系的契机。在此前后,中国学者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建设做了许多工作,陈之骅所进行的教材编写、知识普及、教育教学均属于这一工作。

陈之骅在列宁格勒大学留学期间学习的是苏联历史,1959年回国后即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工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中,是将苏联历史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范畴之中的。“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几个人共同编写第二国际史教材。当时教材缺乏,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①,这是刚刚回国的陈之骅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所作的第一份贡献。教材编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公开发行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是1978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此之前,学术界做了大量的教材编写工作,这些工作均可视为这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准备工作。培养人才的教学工作更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63年,提前结束了在四季青人民公社挂职锻炼的陈之骅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为本科三年级学生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时还是助教的陈之骅为学生讲的第一课的内容是第一国际,由于没有教材,他认真准备讲义,将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理论与多种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做到史论并重、史论结合,授课深受学生欢迎。

陈之骅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作出的第二份贡献是普及社会主义的历史知识。1962年2月起,陈之骅“结合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的纪念日”^②,给《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投稿,陆续发表了30余篇文章。因为陈之骅在列宁格勒大学主修的是与社会主义发展史密切相关的苏联历史,所以他写的这些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宣传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如《伟大和忘我的人——列宁在拉兹里夫》《德国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等。1962年—1963年,陈之骅还参与了吴晗任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写,负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两本书的撰写,众所周知,这是两位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1964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和东欧中亚研究所,陈之骅从国际政治系调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所成立不久,全所就开始集中攻关“苏联高薪阶层的形成”的大课题。显然,这一课题的设置也是受到苏联因素的影响。当时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变质,主要标志是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高薪阶层”。当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关于“苏联高薪阶层”的研究也就不了了之^③。

① 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131页。

② 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137页。

③ 参见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142—143页。

三、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初步繁荣和陈之骅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也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1978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一个重要开端。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此前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的成仿吾担任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原来的国际政治系为基础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系；在山东大学，1962年在学校接受了系统的国际共运史学科教育并留校工作两年的赵明义从中国人民大学调离，到山东大学政治系工作，他在山东大学传承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1978年，在赵明义教授等人的努力下，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创建起来，该系开设的“社会主义学说与运动”课程，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当时设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本科专业，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长期积累的基础，教师们可以随时开设相关课程，所以在1978年只有国际共运史专业进行了本科招生。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在全国率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79年，教育部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为全国高校文科公共政治理论必修课，这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全国首个国际共运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点。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不仅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且带动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专业学会和专业期刊也纷纷成立和创办起来。1980年2月，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并创办《国际共运教研参考》期刊；1982年8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并主办《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期刊。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仅从1976年到1982年的几年时间，我国出版的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教材和参考读物就达400余部。由此看来，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繁荣，学科建设各个方面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

1978年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之骅所作《世界上第一张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在北京市委从事行政工作期间，陈之骅并未停止学术思考，没有脱离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工作。文章重视俄国问题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指出“《新莱茵报》在对外政策上坚决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揭露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和它鼓吹的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实质”^①。在党报发表如此内容的文章，证明了陈之骅的研究能力。该文的发表也为陈之骅一个月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埋下了伏笔。

陈之骅调到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第一份重要工作是创办学术期刊《世界历史》。经过努力，期

^① 陈之骅：《世界上第一张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人民日报》1978年6月5日。

刊在1978年12月面世。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期刊的创办无疑会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与研究,如杂志总第一期就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推荐〈巴黎公社公告集〉》等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文章。担任编辑部副主任的陈之骅是苏联史领域的专家,“根据当时所领导的指示,同时也由于我的关系,在《世界历史》的版面上(包括通过组织一些有关热点问题的讨论会或笔谈等)较多地向苏联史倾斜,以推动苏联史的研究,发现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①,期刊总第一期还刊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评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等关于苏联问题的文章。毫无疑问,创办《世界历史》期刊是陈之骅对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后来,陈之骅又长期担任《世界历史》的主编。

1985年,陈之骅的两项工作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苏联史的研究,一是实际主编了《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二是开始主持新成立的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并连续三届担任研究会会长。这两项工作都对我国的苏联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学与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史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构设置更说明了这一点。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了社会主义史研究室(该研究室后更名为苏联东欧史研究室),陈之骅被任命为首任室主任^②。他召集研究室和高校等科研单位的研究者成立课题组,开始了系统的苏联史研究工作,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后来陆续出版的《苏联史纲(1917—1937)》《苏联史纲(1953—1964)》《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苏联兴亡史纲》等。其中,两部《苏联史纲》是国内较早的两部苏联断代史专著,是苏联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是以“世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机构,担任世界历史研究所苏联东欧史研究室首任室主任的陈之骅不仅领导一批科研人员创办期刊、组织研讨会、主持课题研究,而且凭借熟练的俄语和英语,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考察。1985年,陈之骅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在参加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提交了《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一文,并在大会“俄国十月革命史”分会场上做了《中国的苏联史研究情况》的现场发言,向国际史学界介绍了中国在苏联史研究方面的信息,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1990年,在参加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陈之骅以解放思想的精神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的贡献做了客观评价,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兴趣和热议。1987年,在意大利参加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面对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陈之骅在会上用英语做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引起与会者较大反响,有力回击了西方学者的质疑和抨击,意大利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夕,陈之骅应邀去莫斯科参加“列宁与20世纪”国际学术研讨

① 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187页。

② 参见陈之骅:《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会，向大会提交了《列宁——忠诚的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并在会议上做了现场发言，着重评价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和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其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认可与支持。陈之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开拓学术视野、了解前沿动态、吸收国际学者有益思想和观点，在推进学术交流、增进学术友谊之余，也及时地、正确地向国际学界展示、宣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现状和成就，阐明中国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相关研究及学科建设等基本问题的观点、论断，获得了国际学术界和相关学者的广泛赞誉。

陈之骅主持、参与的这些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教材建设为学科繁荣奠定基础。上述提到的著作要么是我国苏联史研究的最初成果，要么是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它们也通常被作为苏联史的教材使用。基础性教材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著作作为我国的苏联史研究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日后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学术基础。

第二，一系列客观学术观点的确立。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促成了苏联史研究的繁荣，而苏联史研究也是为改革开放事业服务的，“研究历史，特别是苏联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主要是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①。在最初的研究中大家首先达成了几个基本共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历史的发展进程应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禁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两部《苏联史纲》的断代史著作中，对学术界颇有争议的关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评价，都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在充分指出了他的重大政绩的同时，又指出了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错误”^②。对赫鲁晓夫时期采取的政策，“既指出了这些调整在客观上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教条主义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又指出了它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制定具体方针、政策上的主观随意性，以及这些错误倾向对苏联以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③。

第三，向国外学界推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成果，宣传了我国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向国外学界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作为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的助手，陈之骅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分支的副主编，主持编写其中的国际共运史相关条目，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作出了直接贡献。

① 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195页。

② 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198页。

③ 陈之骅：《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200页。

四、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繁荣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仅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而且对向往社会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走上了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正所谓‘万花纷谢一时稀’。”^①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也受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停止招生，只有山东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系仍在坚持招生；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也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科学社会主义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一时也陷入低谷。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在当代中国重新受到重视。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意见明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乘势发展，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2005年，在高等教育中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之密切相连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也迎来了重要发展契机。2012年，作为“马工程”重要成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正式出版，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2018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再次强调要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我讲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历程，那么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很值得深入研究。”^③ 由此，总书记给我们提出了结合历史来研究当今社会主义发展现状的任务。

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新版的《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于2017年由人民出版社一次性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正在陆续出版之中。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1年至2018年陆续出版的64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全面收集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文献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修订再版了21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

①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

②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人民日报》2004年3月21日。

③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

维埃运动（1927—193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这套资料集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2018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世界社会主义史》，2021年，按照党中央要求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中承担了重要角色。2000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成立，李慎明副院长任中心主任，陈之骅担任中心的常务理事。2011年出版了李慎明任主编、陈之骅任副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这部著作影响巨大，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工作领域不断扩大，包括跟踪研究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动态，出版年度黄皮书，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科建设。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常务理事，陈之骅还实际主持了《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自2011年以来，已经出版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巴黎公社：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等近百本小丛书。从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小丛书为普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之骅年轻时参加世界历史小丛书的世界社会主义人物的撰写工作，现在又主持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的出版工作，可以说，在他长青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在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作出贡献。

陈之骅所著《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忠实记录了他多年的学术生涯。他以学习苏联史为开端，毕业后从事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长时期专注于苏联历史的研究后，他又全面投入世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工作之中。陈之骅的学术成就得到了认可和回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学部委员制度后，2006年陈之骅被评为首批荣誉学部委员，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也是终身荣誉；2019年，陈之骅凭借严谨专注的学术精神和优秀深刻的科研成果被评为2018年“工匠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作为个人回忆录的《九十人生——我的回忆录》首先记录的当然是他个人的成长和研究经历，其次则真实反映了他所经历的时代的史，为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的历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长期学术生涯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来看，陈之骅先生完全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和杰出贡献者。

（康乐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郭春生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康晏如]